

大学生公共素质课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中华
优秀
传统
文化

邓庆华
刘娜
杨幸存
主编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

语文出版社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邓庆华 刘娜 杨幸存 主编

ZHONGHUA
YOUXIU CHUANTONG
WENHUA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邓庆华, 刘娜, 杨幸存主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25. -- ISBN 978-7-5187-2415-4

I. K20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RR1769 号

责任编辑 尹鸾飞
装帧设计 李方方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电子信箱 ywbsywp@163.com
印刷装订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80 mm × 1280 mm
开本 A4
印张 12
字数 306 千字
版次 202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2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010-65253954 (咨询) 010-65240052 (购书) 010-65250075 (印装质量)

目 录

绪 论 薪火相传	1
项目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	3
项目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10
项目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14
模块一 文学不朽	18
项目一 诗——唐诗辉煌	20
项目二 词——宋词豪婉	34
项目三 曲——元曲雅俗	45
模块二 艺术璀璨	55
项目一 琴——绕梁余韵	57
项目二 棋——运棋帷幄	64
项目三 书——书画中国	70
项目四 画——丹青神色	77
模块三 科技助力	84
项目一 天——天文历法	86
项目二 农——农业纺织	94
项目三 医——中医中药	102

模块四 社会和谐 113

项目一 节——传统节日 115

项目二 礼——传统礼仪 126

模块五 生活有味 138

项目一 衣——传统服饰 140

项目二 食——传统饮食 148

项目三 住——传统建筑 160

项目四 行——阡陌交通 174

参考文献 184

绪论

薪火相传

知识目标

1. 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脉络。
2.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内涵。
3. 知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能力目标

1. 能列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
2. 能通过文化现象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3. 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素养目标

1.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3. 培养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模块导读

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铸着文化的力量；一个民族前行的足迹，闪耀着文化的光芒。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典籍丰富，流派众多，流光溢彩，蔚为大观。

在中华五千年的浩瀚历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让世界为之惊叹，让国人为之骄傲。其深厚的思想底蕴和独特的内容形式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仅举世公认，而且备受推崇。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种文化形态，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根与魂，化育和滋养着一代代闪耀于人类历史上的圣贤先哲和民族英华，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代又一代先民智慧的积淀。它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更汇聚了中华民族的信心和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我们应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独特创造、鲜明特色，以增强文化自信；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真正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项目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

项目导学

1995年，仙人台遗址经考古发掘，发现岳石文化、西周、东周、汉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等遗物300多件。其中6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邾国贵族墓，出土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随葬青铜礼乐器108件，数量丰富、组合完整。孔子时代追求的礼乐文明，如此直观地呈现于后人眼前。

2003年，危山汉墓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彩绘陶车、马、仪仗俑群等文物。发掘者研究认为，这是西汉济南王刘辟光的陵墓，也佐证了《汉书》记载的“七国之乱”。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平陵城，正是在西汉分封刘辟光之后才成为王都，大兴土木，修筑宫城。

还是2003年，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在一次考古调查中被发现，并后续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盂形器。80多处盐业遗址，有龙山时代的，也有商周时代的，其中，发掘者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大多是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并没有发现住宿之地，也就是说当时煮盐是季节性工作。到了清代中晚期，山东已经开始晒盐，从煮盐到晒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

.....

这些海岱考古的重要发现，帮助我们一次次接近历史，厘清历史，想去了解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将这些置于整个中华文明探源的时间线上，它们也是闪耀的吉光片羽。山东境内考古发现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以降文化，构成了文化谱系完整、高潮迭起的发展链条，成为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重要佐证。

——摘自《新黄河》

悠远浩博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着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以社会政治演变与思想意识革新促成的精神文化日臻丰富为主导，在个体自身不断解放中走向文明的高峰。

请带着以下问题，走进本项目的学习。

这一历程中有着许多影响深远的人和事，请举例说说。



文化概览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了悠久浩博的中华文化。



文化脉络：从上古到
明清的文明密码

一、上古时期：中华文化的孕育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明时期正是中华文化的孕育时期。

文化的实质是“人化”，与人类进化紧密相关。中华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猿人通过打制石器与动物逐渐区分，工具的出现标志着物质文化和意识的萌芽。火的使用（如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掌握了火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发展，但仍属广义工具范畴。约 1 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农业的出现推动文明进一步演进。工具的创造既是物质文化的开端，也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在物质文化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原始信仰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如太阳、土地等；生殖 - 祖先崇拜，如女娲等；图腾崇拜，如龙、凤等。原始艺术主要有原始雕刻、陶塑艺术品和陶绘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以推举方式产生。到了夏朝，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

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发生，一开始即呈多元状态，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黄帝是传说中的华夏各族的共同始祖，曾与炎帝联合打败蚩尤，安定天下。后同炎帝发生冲突，打败了炎帝，被拥戴为炎黄部落联盟的领袖，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殷商西周：中华文化的奠基

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启了商朝此后 200 多年的灿烂文明。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佶屈聱牙、散漫无序，但其间已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等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作为早期国家形态的殷，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思维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色。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



也主宰人间事务。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以尊神重巫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实践经验日益丰富，体力、智力水平不断增进，人们对神的力量的崇拜渐次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曾经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周朝建立后，一是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二是确立了“制礼作乐”，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是确立了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周代的礼制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周人之“礼”，即各种礼节和仪式。周制规定，各级贵族祭祀、用兵、朝聘、婚丧都要遵循严格的合乎其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上下尊卑之别。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其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的观念。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礼制、宗法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以德配天”“惟德是辅”“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华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天无二日

三、春秋战国：中华文化的轴心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标志着东周开始，春秋战国时代拉开序幕。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论语·季氏》），但社会剧变反而催生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核心原因在于社会变革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条件。一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最底层的士阶层解放出来并使他们取得了独立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二是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三是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的宽松的学术环境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四是世守专取的宫廷文化开始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这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上述条件，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所谓“百家”，包括儒、墨、法、道、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等家，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

其中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实践理性，重现世事功，重道德修养。



（一）“礼”是先秦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揭示“礼”的实质，且赋予“礼”道德含义的一位思想家。在孔子之前，“礼”主要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和仪式制度，并不具备道德价值判断的功能。孔子认为用“礼”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比用“刑罚”调整人们的行为更加有效，因此主张“齐之以礼”，这打破了殷周以来“礼不下庶人”的界限。他还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认为“仁”的内涵应是不断地克制自己的冲动，使其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同时人的一切行为都要以礼为标准，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二）“仁”与“义”是先秦儒学的重要思想范畴

从孔子开始，一直到现代，中国人常以“仁”“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先秦儒家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它的核心就是“爱人”。“仁”的内涵还包括“忠恕之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人”“达人”，是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忠”；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恕”。所谓“义”，是指人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义者，宜也”，也就是人的行为与一定的准则相应。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君子义以为上”等主张，强调君子做官的目的就是行义，因此义是最为重要的。

（三）极大地关注人性善恶的问题

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孟子第一个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就是善良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生来都有共同的最基本的天赋本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即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同情心。“性善论”也成为后来儒家的正统观念。在先秦儒家家中，荀子主张“性恶论”，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他认为，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之本性的真实表露，也是人性恶的表现；而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他认为人都有改变本性、成为圣人的可能。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对法家影响甚大，但其始终未能成为儒家的正统观念。



孔子的“仁”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反而又相成，儒、道思想对国人具有深刻影响。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嗣后，商鞅、韩非等不断完善拓展法家理论。法家学说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法，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墨家的创立者是墨子，其追随者多为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下层群体，尤其以手工业者为主。因此，墨家学说注重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尚力”），主张节制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节用”），提倡通过“普遍之爱来消除战乱、实现安定”（“兼爱”）。同时，该学说信奉天神的权威（“天志”），并强调社会管理的统一性（“尚同”）。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撰、修订中华文化的“元典性”著作。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创造，中华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升华，中华文化的走向大致确定。

四、秦汉：中华文化的定型

公元前 221 年，秦朝建立。秦朝统治未久，便因统治政策的失误导致大规模平民暴动，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秦汉帝国的强盛，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当时的文化呈现开拓、创新之态。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面积宏大的长安昆明池，“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产生伟大影响力的丝绸之路的开辟，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成果。

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由西汉汉武帝所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总长超过 6400 千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古代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等漂洋过海输往国外；印度、爪哇、波斯等地的香料、玉器、象牙等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条长达万里的海路，绵延了 2000 多年，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统一帝国的同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厉风行地实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君主专制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朝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华文化之后的历程影响至深。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隋书·牛弘传》），从而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其酷烈性而激起后世儒生士大夫的反复抨击。然而，实行思想一统乃是君主专制政治下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正因为如此，当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时，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董仲舒的思想观点与李斯的“焚书议”可谓异曲同工，他们两位都是在统一的专制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的主要智囊人物。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五、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久已摇摇欲坠的汉帝国土崩瓦解。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杀戮，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一场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政治舞台上角色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眼花缭乱。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西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变。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直至杨隋李唐帝国的一统，纷争战乱才走向落幕。

漫长的民族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华文化变得日益丰腴、厚实，呈现出光耀一时的多元化面貌，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动乱，打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使其逐渐衰落，玄学应运而生。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了道家与佛家思想兴盛的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没落，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

唐王朝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文艺创作上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意识形态上奉行儒释道三家思想并行的政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唐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具有一种明朗、奔放、高亢、热烈的时代气质。

六、宋元：中华文化的沉淀与强化

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气质从唐时的开放、外倾、色调热烈转向精致与内敛，这一转折集中体现在理学的产生上。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功业。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等人在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如宋词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其婉约派作品取径幽约怨悱，极为细腻、精致，两宋绘画富有潇洒豪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另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勾栏瓦肆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市民们醉心于能直接地、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如傀儡戏、杂技、花鼓等。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在元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官学，对后来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明清：中华文化的沉暮与转型

明清两代的文化代表人物中，有“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他的学说高扬人的主体性，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泰州学派”李贽则提出了“童心说”，公安派提出了“独抒性灵”的主张，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更是从不同侧面与程朱理学展开论战。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历史时期，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华文化推入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史新阶段。